

# 前言

## 一、研究動機

京劇形成於十九世紀的北京，而後流佈各地，在京劇發展史上，唯一堪與北京相提並論的京劇重鎮，就是上海。二十世紀以降，上海京班向外流布，足跡北達東北，南抵台灣、東南亞，以上海地區為主發展出來的上海京劇（亦可稱「海派」<sup>1</sup>），其影響之深遠不下於北京京劇。

時至今日，上海京劇與北京京劇有著極為不同的面貌，甚至上海京劇的活力較之北京京劇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對此深感興趣。經過深入考察，筆者認為，其根本的差別在於上海京劇的「當代性」遠甚於北京京劇，而上海京劇的「當代性」建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因此，要探討上海京劇，首先必須觸及其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發展。

然而，到目前為止，對京劇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京劇（亦稱「京朝派」），相形之下，上海京劇的整體發展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遑論其於十九世紀的演進，這促使筆者選擇十九世紀的上海京劇作為研究對象，以補當前京劇研究之不足。又因為研究資料的缺乏（詳見下文「二、研究範圍與前人研究成果」），因此選擇有別於一般戲曲研究習於運用的資料——《申報》戲曲廣告，作為主要論述依據。

---

<sup>1</sup> 「海派」本僅相對於「京朝派」而發，由京朝派口中說出時雖帶有歧視意味，卻也能反映出歷史的真實。但因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度有「惡性海派」的出現，亦即將上海京劇某些為後人詬病的成分誇張揚厲之作，「海派」一詞遂由輕微的歧視轉至深具貶意，因此現今大陸京劇界皆避用「海派」一詞，而以「上海京劇」稱之。本論文討論年代下限僅至 1899 年，當時「海派」與「惡性海派」二詞均尚未出現，因此採用「上海京劇」一詞，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本論文撰寫之目的，並不在為上海京劇翻案，也不在探討新聞報業、廣告行銷與藝術本體之間的關連，純粹基於「十九世紀上海京劇相關資料不足」此一前提，故以《申報》戲曲廣告作為考察十九世紀上海京劇的一個切入點。

本論文主要試圖解決以下問題：在十九世紀報刊戲曲廣告中呈現的上海京劇與現行史志所描繪的上海京劇是否相符？如果有差異，這些差異從何而生？既然有差異，透過當年資料所看到的上海京劇究竟有著怎樣的發展軌跡？

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透過審視當年劇團逐日提供的資料——《申報》戲曲廣告，作者試圖將詮釋歷史的權利交還給「在過去和現在都缺少發言權」的劇團本身，儘可能站在上海當地的角度正視京劇在上海的發展，並經由「戲曲廣告」這種瑣碎卻具體的史料探討上海京劇在中國京劇史上的真正定位，期能彌補現行京劇史對上海京劇研究之不足。



## 二、研究範圍與前人研究成果

到目前為止，大陸地區對上海京劇的討論皆偏重於當代的舞台呈現與未來的發展策略，前者多為散見於報紙期刊的單篇文章，具體討論個別劇目各項製作環節與演出效果；後者則可以上海京劇院理論研究室所編《上海京劇發展戰略論集》<sup>2</sup>為代表，關切重點在於上海京劇在當代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並探索生存之道。此類文章數量雖多，但焦點限於當代劇壇，未及於上海京劇的近、現代發展。

涉及近代上海京劇且較具系統者，僅有《中國京劇史》<sup>3</sup>、《中國戲曲志 上海卷》

---

<sup>2</sup> 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

<sup>3</sup> 馬少波等著。北京：中國戲劇，初版二印，1990。

<sup>4</sup>與《上海京劇志》<sup>5</sup>三書。《中國京劇史》由北京學者主導，以北京立場書寫京劇史，全書依年代分為三卷，近代時期歸於上卷；各卷又分「歷史演進」與「傳記」兩部分，上卷「歷史演進」部分共計十章，論及上海京劇者居其二：「南派京劇的形成與發展」與「京劇改良運動」<sup>6</sup>，而以「南派京劇的形成與發展」一章與本論文有直接關係。該章介紹京劇南來前的上海劇壇，京班、徽班、梆子彼此間的融合，簡單說明上海京劇因主客觀條件配合而得以形成，歸納其於表演、演唱、劇目、布景四方面的特點，最後論及女班（由女演員組成的戲班）與小班（科班）。<sup>7</sup>儘管已涉及戲劇發展的各個層面，但因篇幅關係，對各環節皆僅能點到為止，難以深入表象探討其成因，對其演變遞嬗亦無暇顧及，且受限於寫作年代較早，未及使用近年重新出版的第一手資料，對 1920 至 40 年代的期刊依賴甚深。至於《中國戲曲志 上海卷》，其性質接近百科全書，包羅所有曾在上海活動的戲曲，京劇僅為其中之一部分；《上海京劇志》是《中國戲曲志 上海卷》的副產品，性質近似，而蒐羅更細，全書多數篇幅以條列方式書寫，兩者主要價值在於資料提供。

至於台灣地區對近代上海京劇的討論，似乎僅有陳芳《清代戲曲研究五題》<sup>8</sup>曾特闢章節介紹晚清上海劇壇概況。除此之外，或屬概述性質，或與海派的種種文化現象並置，系統化、理論化的研究為數不多。

目前對上海京劇的研究之所以落後於對北京京劇（「京朝派」）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因素：

---

<sup>4</sup>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6。

<sup>5</sup> 徐幸捷、蔡世成主編。上海：上海文化，1999。

<sup>6</sup> 以上海為主要發生地、部分開明知識份子與京劇演員試圖以改革後的戲曲啓迪民智的一次運動，一般以 1904 年為起點，1911 年前後達到高潮，民國建立後迅速消歇。

<sup>7</sup> 《中國京劇史》（上卷）。pp.246-297。

<sup>8</sup> 台北：里仁，2002。

一、「京朝派」一貫排斥上海京劇。

北京是京劇的發源地，「京朝派」素來被視為正統，就歷史發展而言，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此種信念之堅定無可避免地影響了研究者對「北京以外地區」的京劇之認識。

由於歷史的因素，在 1920 年代，上海本地出現的第一批京劇研究者幾乎也都深受「北京正統觀念」的薰染。在 1920 至 40 年代那個報章雜誌盛況空前的時代，他們為上海京劇留下無數或有所偏、或有所限的追憶、評論與報導，而這批史料又被當代深受「北京正統觀念」影響的京劇史家援引，致使現行京劇史志對上海京劇的討論受到先天與後天的雙重限制。

二、是由於上海京劇的資料不足。



研究任何一個戲劇種類，都必須分從以下兩大面向來做研究：

（一）內部研究：

- （1）劇本文學：劇目類型、劇作家、編劇技法
- （2）表演藝術：演員、表演藝術（唱做唸打）
- （3）演出環境及劇壇生態：劇團、劇院、觀眾、評論

（二）外部研究：

- （1）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政治氣氛、經濟發展（劇種發展的客觀條件）
- （2）文化教育：文化積累、教育水準（影響劇種審美觀的建立）

在外部研究方面，北京京劇與上海京劇的條件相當，都有充足的資料可資依憑。

但在內部研究方面，兩者卻有天壤之別。

北京京劇重視傳統，嚴守家法，變異性弱，因而留下非常完整的資料。就以前述分類而言：

(1) 劇本文學：十九世紀的演出文本至今不僅有大量書面資料留傳，當代舞台演出也依然以古為法，劇目與劇本保存完好，傳承非常穩固。

(2) 表演藝術：演員表演以模擬為主，力求神似前輩藝術家，不僅模仿其表演的一招一式，就連演唱時的換氣、嘴形都力求相同。因此，儘管十九世紀藝術家並未留下錄音或錄影資料，但因為傳承非常固定，其表演藝術仍然有跡可循。

(3) 演出環境及劇壇生態：由於一切都重視傳統，講究師承，劇團與劇院的組織營運變動較少，演出環境與劇壇生態較為固定。且因為北京大量文人仕紳高度介入劇壇，從十九世紀起即有許多相關的筆記、日記、專著；二十世紀以降，又出現更多期刊、回憶錄等書面資料，提供十九世紀北京劇壇研究相當充分的資源。

因此，今人欲研究北京原生京劇並非難事。

然而，上海京劇由於具有強烈的「當代性」，與現實世界緊密結合，從劇目到表演方式都在時時變化更新，變異性強，資料不易留存。同樣以前述的分類來看：

(1) 劇本文學：由於具有強烈的「當代性」，與現實世界緊密結合，上海京劇的

劇目經常更新，即使同一個劇目，演出劇本也會隨時代不同而有大幅度的變動，因此，時至今日，十九世紀的劇目與劇本資料嚴重缺乏。

(2) 表演藝術：同樣由於重視「當代性」，演員表演以創新為尚，不能以師承自限，因此無法以代代相承的方式上溯其根源；此外，上海京劇以武戲見長，但十九世紀沒有錄影技術，欲保存「重武打場面、不重唱腔」的武戲極為困難。因此，十九世紀上海京劇藝術家的表演藝術於今幾乎不可得見。

(3) 演出環境與劇壇生態：這部分的困難來自三個方面：

- (a) 上海京劇自始就與商業經濟緊密結合，隨著十九世紀上海經濟規模的迅速膨脹，京劇界的生態也日新月異，變動不居。
- (b) 上海文人仕紳數量遠低於商賈，十九世紀留下的書面資料為數極少，而且都很零散。
- (c) 二十世紀後的期刊、回憶錄等數量雖多，但上海是個移民城市，居民皆來自外地，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上海居民重疊性並不高，故其種種追憶的可信度也隨之降低。

縱上所述，對十九世紀上海劇壇生態的研究雖不至於如劇本文學與表演藝術、有無從著手之苦，但難度仍然高於研究北京京劇；而且，「劇壇生態」畢竟屬於「週邊環境」，「劇本」、「演員」與「表演」才是戲劇的根本。

因此，今人欲研究上海京劇，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資料嚴重不足的困境。

職是之故，筆者雖因對當代上海京劇深感興趣，而欲追本溯源、探討上海京劇形



成時期（亦即十九世紀）發展的軌跡，但本論文之題目委實無法定為「十九世紀海派京劇研究」。

面對資料嚴重不足的困難，本論文另闢蹊徑，由《申報》戲曲廣告（類似今天的節目單）著手。

本論文之所以選擇《申報》為研究範疇，是因為它與清末京劇在上海的發展幾乎是相始終的。上海第一個京班戲園「滿庭芳」在 1867 年（同治六年）開幕，1872 年（同治十一年）英籍茶商美查（Ernest Major）便在上海創辦了《申報》，<sup>9</sup>一個多月之後，《申報》第七頁便出現「各戲園戲目告白」一欄，這是我國戲班刊登報紙廣告之始。《申報》是中國報業的先鋒，刊載於其上的各式廣告為我國報紙廣告之濫觴，戲曲廣告出現既早，持續時間亦極長，因此選擇《申報》戲曲廣告作為研究晚清時期上海京劇發展之依據在時間上是相當周全的。

比時間因素更重要的是上海京劇的商業性。上海是商業城市，幾乎無物不可為商品，戲曲亦不能置身事外，上海京劇的發展自始就與商業經濟密切相關。在晚清時期，上海是全中國最接近現代化的都市，她的商業機制運作方式對上海戲曲界各個環節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透過這些環節彼此間的互動，構築了上海戲曲市場的獨特面貌。因此，欲研究上海京劇，最重要的是觀察當時上海的商業機制對這些因素的影響，透過商業運作所展現的劇壇生態，才是上海戲曲界最重要的特質，而當時戲院業主在報紙上刊登的戲曲廣告正是今日我們瞭解當時戲班、戲院、演員、劇目等四個生產環節彼此互動的最佳管道，是故本論文以《申報》戲曲廣告為主要資料，探討上海京劇在晚清時期的發展軌跡。

---

<sup>9</sup> 《申報》發行時間跨越清朝與民國，本論文一律採西元記年，後以括弧加註清朝記年（含月日），以利對照；西元記年之年月日均採用阿拉伯數字，清朝記年與民國記年則皆以國字表示。

關於討論時限，本論文選擇 1872 至 1899 年（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廿五年）作為主要討論對象。

京劇在 1867 年（同治六年）被正式引進上海，而《申報》創刊於 1872 年（同治十一年），戲曲廣告之刊登亦始於該年，本論文既以《申報》戲曲廣告為主要論述依據，自當以 1872 年（同治十一年）作為討論上限。

至於本論文討論的下限，則是 1899 年（光緒廿五年）。該年，上海京劇發展史上出現重要劇作——《湘軍平逆傳》，在仔細閱讀《申報》戲曲廣告與其他相關資料之後，筆者確定此劇可視為上海京劇臻於成熟的里程碑；不僅如此，當時所形成的上海京劇種種特徵仍為今日上海京劇所承襲，雖在形式上因時代演進而有所改變，但本質並未動搖，故選擇 1899 年（光緒廿五年）作為本論文討論下限應屬合宜。

關於《申報》的歷史，目前已有徐載平等《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sup>10</sup>、宋軍《申報的興衰》<sup>11</sup>兩本以介紹性質為主的著作。針對《申報》戲曲資料的整理，則有倪百賢等編《《申報》戲曲文章索引》<sup>12</sup>、朱建明主編《《申報》崑劇資料選編》<sup>13</sup>、蔡世成主編《《申報》京劇資料選編》<sup>14</sup>三本重要的奠基之作。至於相關的研究，一般散見於討論上海戲曲、文化、社會的篇章中，雖然兩岸皆有部分學術研究係利用《申報》資料作為論述依據，但多係參考前述諸書而成。真正全面且直接針對《申報》內容進行研究的，以筆者所見，僅有朱瑞月《申報反映下的上海社會變遷（1895-1927）》<sup>15</sup>，該論文隸屬社會史範疇，至於戲曲界，在這方面的

<sup>10</sup> 北京：新華，1988。

<sup>11</sup> 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6。

<sup>12</sup> 上海：上海藝術研究所，1987。

<sup>13</sup> 上海：上海藝術研究所，1992。

<sup>14</sup> 上海：上海藝術研究所，1994。

<sup>15</sup>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張玉法指導，1990 年六月。



學術研究至今尚無直接明顯的具體成果。

### 三、 研究方法

本論文使用的主要資料，為《《申報》縮印本》<sup>16</sup>。儘管已有前述倪百賢等三書對《申報》戲曲資料作出整理，唯此三書編選對象都是報紙正刊所登載之文章，罕有及於廣告，而筆者討論範圍係以《申報》戲曲廣告為主，三書的相關性相對較低。因此，諸書雖亦具參考價值，但筆者仍以逐日檢閱《申報》縮印本原件作為本論文論述的基礎，同時也是舉證的主要方式。

由於筆者對上海京劇的分期基礎係由《申報》戲曲廣告見出（參見下文），而此分期基礎即為本論文劃分章節之依據，且論文大部分論述係來自對廣告的觀察推論，儘管在撰寫過程中（尤其是第二章「奠基期」）無可避免地必須運用其他資料，但這些資料皆係作為《申報》戲曲廣告之佐證，全文論述主軸之脈絡仍出自對《申報》戲曲廣告的閱讀與觀察，故本論文以之為題。

《申報》是近代中國第一份以華人為對象的中文日報，也是發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當時戲曲廣告刊載方式有如今日之電影廣告，而內容則與今日的節目單相似，逐日刊登當日演出訊息，同時也刊載預告。所提供的資訊包括：「劇團」和「劇院」的名稱與地址、「演員」名及其特色、演出「劇目」及其特色、有時也包含票價。若以前述戲劇內部研究的三項分類來看：

- （1）劇本文學：在缺乏劇本的前提之下，報紙廣告至少提供了詳盡具體的劇目、以及情節關鍵。

---

<sup>16</sup> 上海：上海書店，1983-1985。

(2) 表演藝術：在缺乏表演傳承的情況下，報紙廣告至少詳述演員的表演特色。

(3) 演出環境及劇壇生態：廣告內容必然具備劇團與劇院的名稱地點，也提供大量院團營運、行銷的具體情況，可補現有資料之不足。

通過逐日閱讀戲曲廣告，十九世紀各劇團的擅演劇目、著名演員的表演特色乃至劇團與劇院的經營手段均可勾勒成型。儘管廣告的宣傳詞經常誇大不實，在運用時必須極為小心，而且只通過廣告還是無法全面研究上海京劇，但在資料缺乏的無奈狀態下，這就是今日我們所能得到的、關於十九世紀上海京劇相對具體而完整的一份材料，以此為切入點，當足以為京劇史的書寫補充具體資料。

本論文第一章將說明《申報》戲曲廣告之重要性，再以筆者由《申報》戲曲廣告中歸納所得的上海京劇發展分期為依據，進行第二章至第五章之撰寫，最後作一結論。茲分別說明各章大要如下：

**第一章討論《申報》戲曲廣告之大要及其意義。**首先說明《申報》在中國報業史上的地位；其次以兩節篇幅呈現《申報》戲曲廣告之流變與種類，最後提出筆者歸納閱讀心得所作之上海京劇發展分期，作為第二至五章之撰寫依據。

**第二章說明上海京劇奠基期的種種現象。**由於當時劇壇運作之軸心為劇場，故本章亦以劇場為撰寫重心。首先觀察本時期劇場本身的軟硬體設施，其後以三節篇幅輻射探討劇團、演員、劇目與劇場的關係，第六節討論劇場彼此之間的競爭狀況與營銷方式，最後則說明京劇初入上海這二十年間觀眾組成的變化。

儘管本論文以 1872 年《申報》創刊作為討論年代上限，但《申報》創刊伊始曾刊登少量竹枝詞與追憶劇壇過往、描述劇壇現象的文章，其內容皆溯及 1872 年

之前，就中略可窺見 1867 至 1872 年（同治六至十一年）京劇初入上海時的發展概況，由於本章採用部分此類材料，故將此數年亦納入討論，不作刻意劃分。

**第三章探討上海京劇發展期的劇壇概況。**儘管劇場經營者一直是上海京劇界的主要推手，但本時期劇團、劇院的營運體制及其與演員的關係一仍前期，並無變化，而京劇在上海已由「與其他劇種競爭」轉為「與自己競爭」，為因應激烈的競爭態勢，戲園開始嘗試新的劇作類型——「時事新戲」，因此，**對本時期劇壇的觀察焦點也由「劇場」向「劇作」移動。**第一節由鬆動梨園舊制的《火燒第一樓》說起，觀察此劇及其仿效者對當時上海菊壇的影響，說明官方面對新興菊壇潮流的態度，並探討此潮流背後透露的業者心理。第二節首先勾勒本時期六年間的海菊壇大勢，而後說明繼「時事新戲」而起的眾多「時式新戲」在上海京劇發展史上的意義。第三節逐項探討本時期「時式新戲」在劇作題材、舞台美術、審美標準等等各方面的進展，最後呈現一貫謹守家門的崑班如何因應此時的新編戲風潮。

**第四章廓清上海京劇成熟期的發展大要。**本時期劇團、劇院、演員之間的關係仍無多少變動，而隨著劇作類型日漸繁多、以及政治大環境的變化導致時事新戲開始挑戰對官方禁例，「**劇壇與社會的互動**」逐漸凌駕「作品的編演與製作」，成為**影響本時期上海京劇發展最關鍵的因素。**1893 年《鐵公雞》及其後續類似作品《左公平西》在民間大受歡迎，卻一度遭清廷官方禁演，官方與民間截然不同的反應透露當時上海劇界乃至上海政壇背後中西勢力角勝的痕跡，這是本章第一節關注的焦點。第二節接續第一節，說明戲園業者藉著英國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機關「工部局」之力、得以與清廷官方抗衡，使得《鐵公雞》等作品在禁令下越演越盛，不僅帶動上海菊壇的第二度新編戲高潮，從而建立上海京劇自身的獨特風格，也催生了上海京劇的最著名的劇作體式——「連臺本戲」。本章前兩節呈現的是當時菊壇主流，第三節則回頭觀察本時期新編戲風潮下的其他聲

音，馬戲雜技對當時劇作的滲透、以及京崑演員對傳統的堅持是本節討論的兩個重點。

第五章析論在成熟期趨於定型的上海京劇特徵。至十九世紀為止，上海京劇發展出的特徵有三，依其出現的先後分別為：極度重視舞台美術、審美觀偏離寫意而傾向寫實、強烈的「當代性」。三者表現的順序係由形式向內涵逐步滲透，本章亦依此序分別論述：第一節說明舞台美術對上海京劇的重要性及其所由生，並討論「時事新戲」與「時式新戲」先後在提升舞台美術重要性時所發揮的不同作用。第二節討論寫實風格確立的原因及其深層意涵。第三節透過上海城市與大清帝國的對比說明在當時上海人集體意識與主體意識形成的過程，並探討本時期上海人不同於前、不同於外地人（特別是北京人）的視野與心理背景如何決定了京劇在上海的走向，最終導致了上海京劇的形成。

由於本論文大量引用《《申報》縮印本》之資料，為免繁冗，在註腳中以「〔 〕」內的數字代表縮印本之冊數，其後之數字則為頁數，如〔6〕13即指《《申報》縮印本》第六冊第十三頁。此外，另一份資料《新聞報》並未重新出版，目前僅能使用微縮膠卷，<sup>17</sup>無法直接閱讀紙本，亦無頁次可言，因此在引用時僅能註明日期與微卷之卷數，卷數以「【】」中之數字表示，如【31】即指《新聞報》微卷第三十一卷。謹此說明。

---

<sup>17</sup> 藏上海圖書館，共 526 卷。